

请更多代表委员关注乡村孩子怎样完成作业

□ 前溪

作为曾有多年乡镇学校任教经验的教师,我注意到,最近有关作业的话题很热。教育部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强化学生作业管理,不得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各地也先后出台文件,规范批改作业那些事儿。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紧盯谁来批改作业的问题,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在即将召开的今年全国两会上,我希望有更多代表和委员关注乡村孩子怎样完成作业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如何设计和管理工作生作业,正是乡村教育问题的折射。

不得不说,当下学生的作业量挺多的,即便乡镇学校也是如此。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学生做作业做到晚上10点、11点不是个别现象。拿笔者自己的孩子来说,在县城中学读初二,学习成绩居班级前列,也经常做到晚上11点。一般情况下,任课老师布置的作业除了与教材配套的作业本,还会有另外2套练习册,多到自己都改不过来,只能让家长代劳。

绝大多数家长都重视孩子完成作业的情况,但乡村家长对批改作业往往束手无策。有的家长学历低,有的家庭是隔代教育,根本无能力代劳。可是,家长与教师对作业量的认识几乎是一致的,他们觉得作

业做得越多,学习成绩就越好,甚至有家长以作业量多少来衡量教师是否尽责。如果作业量少了,家长就会担心。因此,教师和家长都要对作业数量形成科学认识,明白学生成绩与作业量并不成正比。

教育部要求提高作业设计质量,确保作业难度水平符合实际。这需要学校教务去落实、检查,而且所费的时间很多,乡村学校的师资力量很难办到。我想,不妨以县为单位,通过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结对,实现作业资源共享,以共同体的方式提高作业设计质量。作业设计质量提高了,总量自然能够减少,教师才能全批全改。

作业是对考试的演练。考试多出怪题、

偏题,势必造成作业也跟着走。如果考试难题不降低,仍然要出奥数题之类的难题,家长和学生会如何不加码?

作业还与校外培训机构有关。现在乡镇的校外培训机构同样为数不少,不客气地说,在我们这里最赚钱的就是校外培训机构了。一些家长经济条件不好,也要将孩子送往校外培训机构,因为别家的孩子送了,你不送怎么行?如果不送,孩子也会产生心理负担,觉得自己是另类。校外培训机构布置的多是加深的题目,这也是增加作业负担的负面因素,这就要求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

提高乡村教育质量是全体家长的心



2020年12月15日,江西省广丰区王洋村一个完小的师生在校门外跑步。

声,也是任何有理想、有情怀的教师的使命担当。但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方法并不是通过多布置作业实现的,学生完成的作业不是越多越好。首先,要严格执行教育部的规定,不让学生在层层传达后削弱;其次,要细化操作规范,注意教育资源的平衡;再次,要有问责制,哪个校长不努力提高作业设计质量,纵容教师让家长批改作业,就换掉,换掉几个立马就会见效。

两会 年轻人@你



2019年3月10日,北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

本版图片均由人民视觉供图

2021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经历了不寻常的2020年,今年两会将给年轻人带来什么?将释放哪些新的政策红利?做好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改善大城市里年轻奋斗者的租房品质,为育龄青年提供完善支持与关怀,进一步消除就业歧视,为乡村教育提供政策支持。你关心的事情,两会都会为你关心;说出你的两会期许,两会始终认真倾听。

生育或者升职 不该是道单选题

□ 韩畅

宝宝初次睡觉那晚,没把吸奶器带在身边的我,感觉就像有两块巨石压在胸口。想起生产以来,开奶、堵奶、涨奶、为复工存奶的一系列经历,我在朋友圈写道:每个能在母婴室自如地交流喂养经验的妈妈都知道,当体系性的支持缺失或无法触达这个人时,一味提倡母乳喂养如同枷锁。

刚生产完那段时间,是我得到最多关心的日子。出院后,医院会发来调查问卷并进行电话回访,我所在的社区卫生院也派来医生,为我的身体恢复和新生儿的养育问题答疑,还和我签约了一项名为家庭医生的服务。说到家庭医生,这无疑是个好政策,但医生超快语速的介绍,明显只把这当成一项推广任务,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遗憾。

医院墙上那些关于母乳喂养、辅食添加、发育训练的宣传海报,让习惯应试教育的我快速转化为脑海中的知识点,并输出为一条条行动方案。为此,我时常想,社会不能和我建立这样一种关系,依据不同孩子的情况、不同的成长阶段,把零散的、不体系的知识变成持久的、有针对性的指导?

除了育儿本身的艰辛,工作与生育的冲突,也是一件不得不提的事。在我128天的产假即将结束之际,公司突然宣布业务调整,绝大多数同事被迫另谋出路,余下的同事则要承担超高强度的任务。尽管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辞退哺乳期员工,但在巨大的育儿压力和公司的尴尬现状面前,我经过权衡,还是选择了主动辞职并领取补偿。一方面,这个决定让我免于承受一边通勤加班、一边喂奶带娃的艰辛,但另一方面,这也给我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变数,以至于我至今都无法确定,自己何时才能重返社会,又能否找到对口的工作。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辞职后,一位已育一胎同事来问我如何挂产科门诊的号,我的恭喜二字还没发出去,这位3岁女儿的妈妈就语气平淡地说:刚进新公司就发现怀孕了,孩子来得不是时

候,只能打掉。职场对年轻妈妈的不友好,从这件事可见一斑。

在以孩子为绝对中心的新手妈妈生活中,上网刷视频是我主要的娱乐。其间,我在B站关注到了一位芬兰UP主,她有一个中国丈夫,也是两个混血宝宝的妈妈。芬兰以高福利而闻名,在她生育之后,当地法律允许她休假一年。与此同时,新一届芬兰政府还计划给所有父母同等的育儿假,并将生育后的带薪津贴增加到总共14个月,相当于父母每人164天。

当时,弹幕里很多羡慕飘过,而我想到的是:倘若我也能这样休假,而不必辞职,那么,164天后,公司的业务发展方向已经调整几次了,过去一年的年终总结怎么写?明年的晋升名额,不出意外会落到同期入职的其他同事吧?在我想这些的时候,突然发现,生孩子这件事,似乎有点没意思了。

我的宝宝是2020年出生的中国1000多万名新生儿之一。这个数字,这几年与过去相比有明显的下降。数据说明,谨慎看待生育这件事的家庭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女性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参与到家庭以外生产的时代,我们通过教育、就业、恋爱体会着前20多年的人生,当生育不再是女性的必要职责,年轻女性踌躇了,退却了。其实,这并不意味着年轻女性不想做妈妈,也并不代表新一代人不愿承担抚育后代的职责,只是现实的压力实在太多,才让很多人难以轻易作出生育的决定。

两会在即,社会各界都在热议各种政策话题。如果要问我和身边的同龄人关心什么,与生育保障有关的话题,恐怕承载着最多的期待。我期待可以享受更充分的产假、产期和哺乳假,期待家附近能有门槛低、收费低的公办托育机构,期待有更多的关于如何做一个父亲的社会教育,期待通过制度性的协助、认可和奖励减轻自己身上巨大的牺牲感。在大学生室友纷纷生子后,我们聊天群的主题基本都围绕育儿展开。在妈妈这个身份降临后,大家似乎都变成了个人,把孩子摆在世界的中心。不过,没有一个人表示想生二胎。

当下,鼓励青年生育,似乎是政策方向的一项共识。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能只靠精神层面的劝导激励,面对实实在在的压力,我们更需要实实在在的支持与帮扶。

首先需要尽快规范外卖员、闪送员等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的用工关系,避免因此衍生的工伤认定难、缺乏假期保障、工作时长过长等关乎劳动者权益的问题。此外,也有必要加快推进社会保险对这些群体的覆盖。全国人大代表许小英就曾提议针对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特点,通过制度创新,制定能够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社保政策。

2021年,李军的愿望很动力简单:他希望自己可以每天多接单,一家人都平平安安。今年高考的大女儿能顺利考上北京的大学,与他们早日团聚。李军的目标,也是众多在外打工者朴素心愿的折射。



北京街头的外卖员、闪送骑手。

让大城市的漂泊者 不再为租房发愁

□ 李少波

对于在大城市中工作生活的很多人而言,租房居住是短期内的普遍选择。然而,近两年一些长租公寓的暴雷事件,让公众见识了住房租赁市场的混乱现状,也让不少租客,尤其是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心存焦虑。我对全国两会期许之一,就是希望这些租房乱象可以得到解决,让我和很多有类似困扰的年轻人不再焦虑。

首先,我期待租房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如今,大部分租房信息掌握在房产中介手中,房东和租客之间很少形成对接,导致租客对房产中介的依赖程度较高。于是,有些中介平台就会任意抬高房租价格,以赚取更多中间差价。很多租客对租房市场了解较少,很容易租下房租过高的住房,致使生活成本增加。

因此,我期待国家能发布更多政策与法规,规范租房市场行为,完善租房监管制度,确保租房市场信息的相对透明,以降低租客的风险和成本。

再者,我期待租房市场中一些房产中介不规范的行为能得到纠正。比如,租客通过中介租住房屋时,一般会交数量不等

的押金,多数情况下为一个月的房租。很多租客在租约到期时,却被中介拒绝退还押金。尽管租客根据合同条款与中介据理力争,但往往是徒劳无果,只能忍气吞声,吃哑巴亏。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我在北京的好几个朋友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押金被拒退或迟退。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加大对房产中介经营资质的审核力度,从源头上确保房产中介的专业性,同时加大监督力度,及时查处与纠正房产中介的违规行为,避免出现更大的漏洞。另外,我期待着更多租客维权的渠道,让我们这些租房的年轻人,能有一个靠谱的维权渠道,用最低的成本找回自己的权利。

目前,大城市的房租价格依然居于高位,很多年轻人为了节省生活成本,不得不与他人合租。租客之间的生活产生交集后,每个租客的幸福感和一定程度上都会受到合租伙伴的影响。但因为大家的性格不同,也有不同的生活轨迹和习惯,相处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

因此,我期待在租客提高个人素养之外,社区的居委会能发挥更多作用。比如,社区可以对合租的房屋进行走访,通过举办社区活动,促进租客之间的了解和合作,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区;在租客之间出现矛盾时,帮助他们进行调解,以免

引发更大的冲突。

另外,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缺乏对社会复杂程度的深刻认识,在租房时往往面临更多困惑和顾虑,也就需要更多指导和保障。事实上,租房成了大学生走出校园时面临的第一份考验,有多人在这个问题上交了学费,踩了租房市场的坑和雷。针对此问题,可以尝试由政府牵头,联合信誉度高、服务能力强的房产中介平台,为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提供相对可靠的房源,帮助他们在大城市立足。

真正做到规范租房市场,保障租客合法权益,既需要政府在政策和制度上做出必要的优化和补充,也需要相关部门努力改善租客租房的生活和心理体验,如此一来,才能让我们这些漂泊在大城市的人,在租房时更加安心。



4年闪送的他 也想有五险一金

□ 任冠青

骑着饱经风雨的电动车,每天保持在线10小时以上,日行100公里起步,这就是43岁的李军作为闪送员的工作日常。

干我们这行,没有休息日,基本上只要是在北京不回家,那就是一个字:干。2021年是他北漂生涯的第十年,也是他从事闪送的第四年。刚开始,闪送员没有那么多算法似乎也不是那么聪明,从家所在的东四环出发,好不容易赶到了远在西北六环的沙河,系统一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调配,又任性地把她跨调到了西南六环开外的良乡。虽然有些无奈,李军也只能接受指令,硬着头皮绕北京城跑圈。

后来,同行越来越多,算法更加智能,李军也有了自己专门负责的服务区。可是,长期在户外工作,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依旧少不了。最初,家里人还会担心他的安全,怕他发生危险,时间久了,也就慢慢习

惯了。对他而言,这份工作相对灵活自由,没有太多要求和约束,只要保持一定的跑单量,就能获得较为固定的收入。每天早出晚归的日子虽然辛劳,但一想到留守老家的父母和两个女儿,自己便感到无比充实。

这份工作,也让他琢磨出不少朴实真挚的人生味道。刚开始做闪送员时,正赶上夏日炎炎,一位客人让他等了很久,最终打了3遍电话才出来。正当他有些烦躁、差点发火时,对方从身后变出一瓶冰镇可乐,暖心地说了句:这么热的天,师傅辛苦了。听到那句话,他心里的火气一下全没了。每天跑单,他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人。而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还是好人更多。疫情期间,李军也在回馈着这些人间善意,尽自己所能多作贡献。在疫情蔓延初期,他看到有一单挂了很久没人接,因为地址是在医院,大家都比较紧张。后来,李军还是选择接了这单,也没有收对方要给的红包。他说:就算是我作了一点点小贡献吧。

不过,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由外务工人员和网约工双重角色交织产生的新老问题,也让李军心底生出不少愧疚、忧虑与不安。家乡衡水离北京虽有200多公里,他不到三天就能轻松跑跑的工作里程,可是与亲人分别的这段距离,却让李军再难跑进小女儿的心里。自她6岁那年不得不回老家上学后,孩子的话就越来越多,甚至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喊过爸爸了。外出拼搏让李军无暇照顾家人,对父母和孩子都产生了亏欠感。

李军心里清楚:他与平台只是商业合作关系,并没有签订雇佣合同,也没有五险一金。长期在户外工作,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的几率相对较高,不幸出现工伤后会不会有维权难问题?一旦行业发展出现大变动,基本收入得不到保障后怎么办?自己已经40多岁,没有养老保险,年老之后又该怎么办?这些切实存在的问题,不时激起他对于未来的焦虑。

解决这些摆在眼前的困境和难题,成

为他对于今年两会的最大期许:作为一名父亲,他希望国家的教育政策能对留守儿童多一些关注和扶持,让长期在外的他们少些牵挂,更加安心。作为一名劳动者,他也希望能够获得更加有兜底功能的劳动保障,让自己也可以拥有社保。

正如李军所说的,他只是外出打工者中最平常的一位。外卖员、送菜员、跑腿员、网约车司机,这几年,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发展渐成气候,相关从业者中,许多都是外出务工人员。据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9年,为共享经济提供服务的人数为7800万人,同比增长4%。人社部于2020年8月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现状分析报告显示,网约配送员的就业群体规模迅速增长,每天跑在路上的网约配送员已经达到百万级。

他们整日奔波穿梭,有如城市运行中必不可少的一根毛细血管。由于行业发展较快,相关劳动和社会保障仍不完善,许多人都面临着与李军类似的问题。对此,

面试时, 别问我有无男朋友

□ 小鱼仔

转眼到了3月,我也迎来毕业季。去年秋招开始时,我犹豫再三,尽管就业压力比较大,本科生就业优势不是特别突出,我还是选择先就业,到社会上闯荡几年。

秋招期间,大致就是关注本校就业中心发布的招聘信息,还有参加外校举办的招聘宣讲会,找工作就像过关打怪,会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拦路虎,有些则令人备感无助和沮丧。

平常学院群里或就业中心的公众号上,会发一些就业信息。虽然有的职位我并没有考虑,但点进去,看到不少岗位都是某某机关(企业),现招募某某岗位,需要法学专业若干人,限男性,有符合条件的学生,联系报名。这让我很疑惑,专业能力的高低,和性别有绝对关系吗?还是这些岗位都对性别有特殊需求?

面试互联网企业时,我也隐约感受到性别歧视。在一次机会宝贵的面试中,一切都进行得比较顺利,虽然薪资待遇比预想低了点,但我想着自己的专业不太对口,职场都得重新学起,慢慢来吧,这都不是事。然而HR却问我有无男朋友,这让我觉得有点侵犯个人隐私。

记得当时遇到同校同专业的男同学,我们俩前后脚参加面试。当他面试结束后,我打趣地问他,HR有没有问你有无女朋友这类的问题,他摇头说没有。我本来想,这或许只是HR无心的一问,但联想到现实中有公司因为女员工结婚生育的成本,而不愿意招聘女性,我就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遭遇了性别歧视。关键和那位男生聊天间隙,我们还谈到了月薪。神奇的是,我们报了一样的期望月薪,但HR告诉他的,却比我的要多出300元。

我暗暗叹气,一样的部门,同样的HR面试,而且专业、经历资历,那都是应届生,为何我的工资就比那个男同学低呢?这是遭遇同工不同酬了吗?之后,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能力太差。遇到这样的事情,即便去问HR,会不会只得到一句,综合能力存在差异,所以两个人工资不同的答案呢?

新年过后,当我浏览各地省考公告时发现,很多岗位的招聘要求写着几个字:限男性,比如一个岗位要求本科应届生,专业限法学,总共招聘6人,其中3个人要求限男性报考,另外3个人则性别不限。我一直在想,这样的限制,会不会导致同一职位,女性报考者之间的竞争压力变大?想起来之前一个考公前辈的话,女生要努力把笔试成绩提高了考,因为报考该岗位的女生太多,竞争会非常激烈。

经过秋招和实习,我意识到校园外的世界,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简单和完美。对我个人来说,在求职择业时,首先要学会承认自己的缺点、不足,这样在遭遇客观困难时,才不会自怨自艾。同时,遭遇不公平的对待,也让我思考,消除就业性别歧视任重道远,尤其那些隐性的歧视,可能发生在无声无形中,对待性别歧视现象,求职者有必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最近,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除军事、国防和公共安全等部分特殊院校(专业)外,高校不得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可能发生在无声无形中,对待性别歧视现象,求职者有必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2月27日,求职者们在江苏省扬州市新春招聘会上寻找合适的岗位。